

# 近世人物志



国家图书馆  
古籍部

中华书局  
数字图书馆

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入驻商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 近世人物志

金梁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世人物志/金梁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013-3432-2

I. 近… II. 金 III. 名人—列传—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723 号

责任编辑 王冠

装帧设计 龙传人 徐力坚

书名 近世人物志

著者 金梁辑

---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新华书店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

66174391(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大兴古籍印刷厂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印张 15.375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

书号 ISBN 978-7-5013-3432-2/K·1484

定价 39.00 元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

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

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借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縹緲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

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鈎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

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樑。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纍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



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

在太平軍區域內，爲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爲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

吾爾文、倭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買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 金梁其人與《近世人物志》

孔祥吉

——兼論其以日記勾畫人物的治學特色

一

金梁（一八七八—一九六二），字息侯，滿洲正白旗瓜爾佳氏。祖父名觀成，號葦杭；父名鳳瑞，號桐山，均為杭州駐防旗人。<sup>①</sup>金梁晚年曾自署其號為瓜圃老人，然而，據金梁本人《瓜圃叢刊叙錄》則稱：「家父所刊叢書，以關於掌故者為多，原擬名

<sup>①</sup> 金梁：《重印辛亥殉難記跋》，《瓜圃叢刊叙錄》，民國排印本，第四頁。又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九輯，第二八五冊。

一

《國故零刊》，瓜圃爲龍湫故園名。先曾祖父別號瓜亭，著有《瓜亭雜錄》。先祖父偶亦自署瓜山。家父曾於盛京東陵關地種瓜，用故園名，自號瓜圃老人，遂以改題所刊叢書曰《瓜圃叢刊》，皆取義於瓜爾佳也。<sup>①</sup>可見，金梁以及祖上對瓜爾佳頗具思念之情，對瓜圃情有獨鍾，均喜以瓜字爲號。

金梁出生於杭州新龍巷之新衙，自幼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中舉，甲辰（一九〇四）成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大學堂提調、監察御史、內閣中書、內城警廳知事、奉天旗務處總辦等職。

金梁年少時有一件事使他名揚四海。即沈曾植所稱「三上萬言書，以忠直名海內」。<sup>②</sup>關於此事之原委，湯壽潛曾有《戊戌上書記書後》一文記叙頗詳。其文曰：

戊戌政變，黨錮案興，邏騎四出，禁會封報，道路以目，至不敢偶語，舉世奄奄無生氣矣。乃忽有人焉，冒死發言，大聲疾呼，使人心為之一震，豈非豪傑之士哉。

①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總目，第三頁。

②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第三十頁。

金君梁滿洲瓜爾佳氏，伏闕上萬言書，言詞激烈，指斥官闈，且直詆時相，請殺之以謝天下，萬口喧傳，中外名人爭以一見顏色為榮幸。而當道取媚時相，欲羅織下獄，屈辱備至。適時相亦瓜爾佳氏與君為同族。君兄方入覲謁時相，時相竟嘆息謂之曰：吾族有此才而不見用，此亦宰相之貴也，願先約一面。語傳事始解。然君終不往見。其後遂有常熟沈某請殺三兇之書，世之論者，往往並舉二人之名，謂吾道不孤，然君純乎忠愛士也，以視世之病狂中熱，姑發危論，以是為標榜之具者而君超然遠矣。<sup>①</sup>

上文中所稱「時相」，係指與慈禧一起發動戊戌政變的大學士榮祿，亦屬瓜爾佳氏，時身兼將相，權傾舉朝，號為寵臣。<sup>②</sup>「沈某」，則是指翰林院編修沈鵬。

沈鵬（一八七〇—一九〇九），字誦棠，號翼生，又號北山，出生在有着豐厚文化蘊藏的江蘇名城常熟。沈鵬因不滿戊戌政變後守舊黨的倒行逆施，冒死上書，要求朝廷

① 湯壽潛：《戊戌上書記書後》，見《瓜圃叢刊叙錄》，第二十八—二十九頁。

② 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卷上，民國排印本，第一一〇頁。

改弦更張，歸政光緒，並處死榮祿、剛毅等奸臣及太監李蓮英。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沈鵬的「奏為權奸震主，生禍招災，請從嚴懲治摺」在天津《國聞報》刊登之後，舉國上下，為之震動。<sup>①</sup>惱羞成怒的慈禧頒布上諭指斥編修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衣冠敗類，即著革職，永遠監禁。」

金梁身為滿人，却能與沈鵬一樣，敢於在守舊勢力猖獗一時的恐怖環境下，主持正義，不顧生死，上書請殺權臣榮祿，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舉動。十多年之後，慈禧以民政部保舉案召見金梁，再度提起此事時，尚「怒目相對」。<sup>②</sup>

又據孫寶瑄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一九〇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日記亦曾記載稱：

日中，訪叔雅。映，與偕至金谷香，因邀彥復、枚叔及張冠霞至小談。枚叔輩戲以《石頭》人名比擬當世人物，謂那拉，賈母，在田，寶玉，康有為，林黛玉；

① 《國聞報》，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摺稿照錄。

② 金梁：《四朝佚聞》，民國復東版，第七頁。

梁啓超，紫鵑；榮祿、張之洞，王鳳姐……沈鵬、金梁、章炳麟，焦大。①

可見，金梁上書殺權臣榮祿，在當時知識分子中流傳已相當廣泛。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三月，徐世昌調金梁督辦京師外交巡警。當時北京郊外，地極遼闊，措治爲難，金梁到任之後「悉心籌劃，調查測繪，分科並舉，未月餘而大致定，上之民部，見者稱善。」<sup>②</sup>後來，那桐主持民政事宜，對金梁之才幹，亦頗爲推許。

金梁之才幹頗受當時朝臣之矚目。墾務大臣信勤，曾指名道姓地上書朝廷，要求調金梁差委。其奏章云：

墾務大臣信勤請調中書金梁等摺。

爲墾務需才，擬調得力人員，以資任使，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綏遠墾政，內蒙古東西盟等處，地勢廣漠，熟荒輟輻，庶務本已殷繁，而此次查辦大臣協辦大學士

① 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三七二頁。

② 金梁：《東瀛文牘序》，《瓜圃叢刊叙錄》，第三十頁。



鹿傳霖，前復陳善後五事，均為切要之圖。奴才任重才輕，夙夜憂懼，惟有求才自助，庶免貽誤事機。茲查有內閣中書金梁……等十員，吁懇天恩，俯准調往差委協。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奉硃批：著吏部知道。欽此。<sup>①</sup>

此次調動雖然未能成功，然而，由此却不難看出金梁在清末官場中，已是引人注目的年輕能員。

光緒末年，面對俄國、日本等列強對東北日益加緊的侵略，清廷着手整頓東三省政務。金梁隨同新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來到盛京（今沈陽），擔任旗務司總辦兼管內務府辦事處事務。而在錫良接任東三省總督之後，仍上書請求金梁留任，並奏保為總辦。據金氏所撰『奉天旗務司』一文稱：

徐東海督東，改定官制，分辦新政。而將軍舊署所管八旗五部三陵內務一切

①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光緒三十四年錄副奏摺，吏治類。

事宜，則設旗務司使統轄之，與司道並列，其職權繁重，幾與督署相埒。余初至奉，即司旗務。東海內調，錫文誠公良接任，改司為處，奏保總辦。略稱：現充旗務處總辦某某，精明篤實，任事血誠，忠義天生，勘膺艱巨。自上年總司旗務，規劃經營，具有條理，就地籌款，興辦學堂、工廠及銀行等事，借廣生計，成效昭著，建議還旗殖邊，練兵固本，尤見規模深遠，實為一時難得之才。該員由知府保道員，並以副都統記名，擬墾（懇）恩准留奉，仍充旗務處總辦云云，奉旨允行。余與文誠，向無一面，乃辱知遇，引參機要，原定五年計劃，實邊固本，以為緩急之圖，而不意時不我待，終無補於大局也。<sup>①</sup>

在趙爾巽接任東三省總督後，金梁繼續留在盛京任職。

大約是因為擔任旗務司總辦兼管內務府辦事處職務的原因，金梁開始對研究盛京書畫、掌故以及滿文老檔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於十多年後出版了《盛京故宮書畫錄》、《滿洲老檔秘錄》等介紹滿族歷史文化的書籍。

① 金梁：《光宣小記》，民國癸酉刊本，第一二二頁。

其中，金梁對滿文老檔的搜集整理以及注釋翻譯，堪稱是一件頗有價值的工作。這些深藏沈陽故宮的史料，是研究滿族興起史最重要的原始素材，均用無圈點老滿文書寫。雖然在乾隆年間曾經用新滿文重抄，但是因年代久遠，殘缺不全，僅存天命前九年（一六〇七）至清崇德元年（一六三六）百餘冊，整理翻譯，尤為困難。金梁在《滿洲老檔秘錄》序言中稱：

盛京故宮舊藏滿洲老檔一百七十九冊，分紀天命、天聰、崇德朝事，多三朝實錄、開國方略、東華錄所不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誠三百年來之秘史也。原本為無圈點體滿文，字近蒙古，與通用滿洲文字不同，翻譯至難。經滿、漢文學士十餘人之手，費時二載，今始脫稿。當分編百卷，以卷帙過多，校刊非易，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秘錄。<sup>①</sup>

這些滿洲秘檔的重要價值在於，它與坊間留傳的實錄、本紀多有不同。蓋因續修

①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第十八—十九頁

實錄、本紀時不免諱飾，已多削改，而這些滿洲秘檔，獨存其真。比如清朝國號之稱呼，初曰滿洲，天命年已稱後金，見於遺朝鮮國王書；天聰年則稱大金，見於金漢蒙古子弟讀書論及奉天城門題額；崇德年始稱大清，見於陳杜明等書，始不復用滿洲國號。總之《滿洲老檔秘錄》的出版，為研究清朝入關前之歷史，提供了十分可信之史料，也對滿族歷史文化研究作出了貢獻。

## 二

直到清朝滅亡後，金梁才離開瀋陽，先到大連，而後回到了北京。由於他出身於滿族世家，對舊王朝充滿依戀之情。早在辛亥革命於武昌爆發不久，金梁在瀋陽即曾經策動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帶兵入衛，企圖以武力鞏固搖搖欲墜的清王朝。他在《趙次帥》一文中寫道：

趙次帥爾巽為東督，聞鄂變，謀自保。余說之以入衛。時正克漢陽，趙輒答曰：漢陽已下，變局定矣，何必多此一舉乎？袁潔珊金鎧，其所信任者也，聞亦

說之。則曰：策甚是，惜老夫非其人，若吾季其庶幾乎？指其弟爾豐也，爾豐已被害矣。趙以保境安民為名，設保安會，自為會長，召張作霖入省，以舊軍監新軍，嚴懲亂黨，地方幸得苟安，而作霖之勢遂成。<sup>①</sup>

金梁在北京期間，正是風雲變幻，政局動盪之時，但是他却始終以復辟舊王朝為己任。一九二四年初金梁還被清室遜帝溥儀任命為小朝廷的總管內務府大臣。是年十一月，小皇帝溥儀被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驅逐出故宮後，金梁對此非常不滿。溥儀遷往天津之後，金梁仍然極盡全力為小朝廷奔走，風塵僕僕地往來於京津之間。而後，他曾一度回到東北瀋陽作過張學良的老師，「九·一八」事變後，金曾出任「奉天地方維持會」的委員，為日本侵略者效力。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金梁又與日本特務等一起赴天津，策動寓居天津的溥儀潛赴東北。

但是，在日本侵佔東北並建立偽滿洲國之後，金梁由於家人反對以及人事方面等原因，他並沒有在偽滿洲國任職，而是選擇了隱居天津，埋首著述，雖然生活清貧，却樂

① 金梁：《光宣小記》，第一五一頁。

此不疲。他在《光宣小記叙》曾敘述當時的心情以及境況稱：

辛未秋，東事起，余子身至津，閉戶養疴，不問世事，謠詠頗多，是是非非，皆置不辨。惟書畫舊藏，殘稿零札，未及攜帶，長日無聊，殊難遣悶，偶返故都，檢舊篋，得昔年日記數冊，皆光宣間所筆記，遂擇有關朝章國故者，撮錄成編，題曰：光宣小記。余自甲辰春，始北上應試，至辛亥冬，避地大連，故所記以甲辛數年為斷。後別有記，今津樓臥室，方不及丈，局促如囚，嘗自書小聯懸諸壁，集句曰：自作孽，不可活，身將隱，焉用文。深夜幽思，耿耿不寐，乃復草此記事，與世相見，徒召笑罵，其終亦不免與自文歟。

癸酉秋一息老人金梁。<sup>①</sup>

這一時期，金梁在學術領域裏還作了兩件事，值得一提。

其一，趙爾巽在京出面組織《清史稿》的編纂時，金梁亦隨趙氏參與了《清史稿》有

① 金梁：《光宣小記》第一一二頁。

關事務，曾擔任辦理史稿校刻事宜。當時參加《清史稿》的編纂者，大多為清朝遺臣，老氣橫秋，氣息奄奄。而金梁却正當精力充沛之際，因此非常活躍。當《清史稿》纂畢以後，凡五百三十六卷。趙爾巽由於健康原因，「心力已竭，老病危篤」，<sup>①</sup>急於將「並非視為成書」的《清史稿》盡快印刷，並委託金梁負責校對之職。金梁則利用校對刊印之便，給自己冠以「總閱」的名義，並附刻其《清史稿校刻記》，又增加了《康有為傳》、《張勳傳》、《張彪附傳》，然後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形成了所謂《清史稿》的關外本。金梁的行爲引起清史館同仁的不滿，他們把留在北京的七部全部改回原來面目，並且刪去金梁的「校刻記」，又形成了所謂關內本。

金梁還利用參加《清史稿》編纂的機會積累史料，增擴見聞，後來陸續編寫了一系列與清史有關的書籍，諸如《清帝外記》、《清后外傳》、《清宮史略》等。金梁的這些做法，曾招致一些參加清史稿編纂事宜者的非議。現在看來，這種批評未免有些過於苛刻，因為金梁編寫這些書籍，畢竟給後人留下了可資借鑒的史料。

其二，金梁參與了拯救八千麻袋「大內檔案」事件。所謂「大內檔案」，是指存放在

① 趙爾巽：《清史稿發刊綴言》。

紫禁城內閣大庫的檔案。其中包括有詔令、硃諭、簿冊、文稿、奏疏、外國的表章、歷科殿試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均爲有關清朝歷史的原始資料。金梁聽到這批內閣大庫的檔案被當作廢物處理之後，立即設法探尋這批檔案的下落。原來這些珍貴文獻已經被北京西單牌樓同懋增南紙文具店作爲廢紙收購。他在《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叙》中記述曰：

同懋增紙店實購自歷史博物館，八千袋費金四千，將運往定興縣紙坊重造紙料。聞之大驚，乃定期約雪堂沈庵偕往同懋增，則謂車運造紙已過半矣，僅檢留數袋，立許五百金携歸，並囑速追餘件，當三倍其原值酬之。往返兼旬，居然陸續運還，堆置彰儀門貨棧卅餘屋，連前後五院露積均滿，高與檐齊。即付價二千金，寄存商品陳列所大樓，延招十餘人排日檢視，頗多珍異之件。<sup>①</sup>

金梁與其好友羅振玉合作，「初將銷燬奪於火劫，終將造紙奪於水劫」，爲搶救這

① 金梁：《瓜圃叢刊叙錄》，第二十頁。



批珍貴文獻做出了貢獻。不管他們當時出於什麼動機，其結果則是爲後人研究明清兩代歷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還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四號（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了《內閣大庫檔案訪求記》一文，宣揚搶救歷史文獻之重要。

## 三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金梁沒有在政治上隨波逐流，像鄭孝胥等人那樣到偽滿洲國去當官，而是致力於學術研究，這段時間可稱是金梁學術上的輝煌時期。他躲在天津小樓裏，與世隔絕，埋頭著述，編纂了許多頗有價值的清史著作。《近世人物志》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金梁爲編寫《近世人物志》花了許多氣力，他用了大量時間，把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記》（中華書局排印本稱《翁同龢日記》）、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王闓運的《湘綺樓日記》、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認真閱讀，仔細挑選，斟酌概括，以人分類，並按時日先後，排比整理，編成了有六百餘人的《近世人物志》一書。

金梁所選擇的以上日記各有特色，均極珍貴，號稱晚清四大日記。其中以《翁同龢日記》爲最重要。

翁同龢（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字聲甫，號叔平，晚號松禪，江蘇常熟人，大學士翁心存之子，咸豐六年狀元。曾爲同治、光緒兩朝帝師，先後擔任過刑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工、戶諸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兩度任軍機大臣，並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上行走。他學問淵博，居官清廉，尤其是在光緒皇帝親政之後，皇帝「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sup>①</sup>光緒帝的許多重大決策，幾乎都在書房中與翁同龢討論，然後再決定進止。正是因爲翁同龢在晚清政壇上這種極爲重要的地位，決定了他的日記價值，是迥非尋常的。故研究近代中國史的學者，幾乎无不重視《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於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九〇四年七月四日）去世後，其日記原本一直由其後人珍藏。該日記起自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一八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光緒三十年五月十四日（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止。在長達四十六年的時間裏，翁氏日有所聞，晚必記之，不避寒暑，長期堅持，字斟句酌，一絲不苟。翁氏弟子張元濟稱：「四十餘年大事，粲然具備。」<sup>②</sup>

① 《清史稿》，卷四九一，翁同龢傳。

② 《翁文恭公日記》，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五年影印本，跋。

金梁所選擇的另一部日記，是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李慈銘乃晚清著名學者，滿腹經綸，才望傾朝，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志伯，號蕓客。據平步青所撰墓誌銘稱，李氏「生有異才，長劬學，書無不窺。道光庚戌，吳晴舫侍郎督浙學補縣學生員。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貲爲部郎，而爲人所給，落魄京師，倪恭人亟鬻田成之。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君才望傾朝右，獨鍵戶讀書，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sup>①</sup>

李氏日記起於清咸豐甲寅（一八五四）三月十四日，迄於光緒甲午（一八九四）元旦，長達四十年之久的朝野大事、各地見聞、文物考據、學術心得、山川遊歷以及北京、江南等地的社會風貌等內容在日記中一一羅列，真可謂美不勝收。

王闈運的《湘綺樓日記》是金梁所選的另一部日記。闈運，字壬秋，又字壬父，湖南湘潭人。其居所爲湘綺樓，故人稱湘綺先生。他生於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卒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湘綺樓日記》起始於同治八年（一八六八），結束於一九一六

① 金梁：《近世人物志》，民國排印本（後同），第二十頁。

年，爲時近半個世紀。王闈運「刻苦勵學，無間寒暑。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講學湘蜀，得士最盛。日記中皆纖悉靡遺，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數參軍幕，間預政要，其間人物消長，政治得失，身經目擊，事實議論，釐然咸在，多有世人未知者。讀者作日記觀可，作野史觀可，作講學記觀亦無不可」①。

金梁所選的最後一部是葉昌熾的《緣督廬日記》。昌熾（一八四九—一九二七）字頌魯，號鞠裳，晚號緣督，江蘇長洲人。他一生坎坷，家境貧寒，學識宏富。自光緒二年（一八七六）中舉後，直到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才中進士，官至甘肅學政。《緣督廬日記》上起同治庚午的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五日，下迄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前後長達四十八年。

吳郁生在爲其日記作序時稱贊他：「治漢儒經說，旁及金石目錄考訂之學。」以光緒丙子舉於鄉，潘文勤、吳憲齋、汪郎亭諸先輩爭相延致。己丑入詞館，同官京朝。君不通聲氣，不驚時名，閉戶著書，無異寒素。酷嗜金石文字，山巖屋壁，斷楮殘拓，珍如

① 《湘綺樓日記》，商務印書館影印本，跋。

性命」。<sup>①</sup>王季烈亦稱葉昌燾對寫日記格外認真，「因有臧否人物、規誨親故之詞，遺命戒勿以全稿示人」。<sup>②</sup>

這些日記數量多，時間跨度長，出自於翁、李、王、葉四人之手。內容豐富，取材多樣，從不同時間，不同角度記錄了這六百餘人的所作所為，比起坊間流傳的筆記野史，要可信得多，具有很高的利用和研究價值。

金梁之所以重視日記史料，與他早年從事《清史稿》校勘的經歷，尤其是出版《光宣列傳》的實踐，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正如他在《近世人物志》前言中所稱：

欲考人物，僅憑正傳，既嫌過略；兼述野史，又慮傳誤；皆不必盡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難，光宣列傳，力矯斯弊，乃採及近人日記，終為史例所限，亦不能盡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記，如翁文恭、李越縵、王湘綺、葉緣督諸家，為時所重，足與曾文正日記並傳。其中知人論世，發潛搜隱，實可補正史所不及。

① 《緣督廬日記》，吳郁生序。

② 《緣督廬日記》，王季烈序。

翁、李、王、葉，史稿四傳，皆經我手，世目翁為權臣，而翁傳兼寫德宗，君臣一德，遂成賢相，竟不能見怙權之迹。李傷匪類，王嘆無行，葉較自好，亦復多偏，而儒林文苑，胥為通儒，非觀日記，不克睹其真像也。<sup>①</sup>

金氏所述，雖不無過分夸大其在《清史稿》編纂過程中所起作用之嫌，然而，他對日記之重視，顯然是因為長期從事清人傳記編纂，深知離開日記，傳記便寫不好。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金梁才能不畏勞苦，長期堅持，從大量繁瑣的日記素材中，選擇史料精華，記錄了許多近代政治舞臺上活龍活現的人物。金梁說：「其中毀譽，一依原來，不復稍加修飾，以存其真，是是非非，錄者不負責任也。」

金梁不愧為利用日記的行家裏手，他在開始選材時，曾對為數眾多的清人日記進行篩選，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仔細考訂之後才決定是否錄取。比如他在寫傳記時，曾對《景善日記》產生過興趣，但經推敲，即發現其作偽痕迹至為顯明，金氏稱：

①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一頁。

景善，禮部侍郎，殉庚子之難，有日記傳世，且譯以英德文，為西人所重視。聞德軍得自景宅中，多為慶王、榮相解釋語，榮祿之得免禍首以此記也。西人以親於景宅檢出，故毫不置疑，而不意竟由偽作也。余校刻清史時，景善日記就流傳海內外，視同信史，余亦震其名，擬於忠義傳內，補撰專傳，乃取日記詳核之，月日時事，皆不盡符。且景為休致侍郎，觀其所記，抑若與聞朝政，尤為不類。初不能解其故，後乃恍然，此記蓋專為榮洗刷作也。當時榮已列禍首單，其黨偶見景記，遂攫以竄入他語，重仿一冊，置之景宅，故引德軍入檢，而西人不得不墜其術中矣，其用心亦良苦，榮竟得藉以免禍，真天幸也。余既得其真相，初改專傳為附傳，擬略正其誤，繼思偽記何可入史，乃僅以景善名字，綴於彙傳，但著其同被難而已，於偽記不著一字，此亦史例。而見者或舉以為責，故茲復詳釋之。<sup>①</sup>

晚近以來對《景善日記》曾有過不少的考證，從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認為

① 金梁：《四朝佚聞》，第四十四頁。

「其日記必可信」<sup>①</sup>，到目前為止學界又大都認為是偽造的。其實只有金梁的論說才是最合情理。即使是對已選入的翁李王葉四家日記，金梁仍進行仔細分辨，小心求證。例如金梁在用各家日記勾勒李慈銘生平時，採用葉昌熾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日記的記載：「唁越縵先生之喪。」<sup>②</sup>而《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一八九五年七月一日）却記有：「李蕤客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李慈銘甲午已死，乙未決不可能再去登門訪問翁氏。金梁在排比日記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盡管《翁文恭公日記》是影印本，但是，却依然存在有篡改問題。金梁對此頗有疑問，略謂：

翁記似有重繕改易處，如李蕤客卒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閏五月初九日尚記李蕤客來，初頗不解其故，繼思翁自戊戌罷歸，不無顧忌，甲乙數年，正直樞要，凡所記載，尤慮觸諱，自取刪繕，亦屬常情，甲午之事，誤入乙未，蓋一時疏

① 黃潛：《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影印本，第九十六頁。

②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二十頁。



忽耳。<sup>①</sup>

三三

此後，晚清史及戊戌變法史研究者對翁氏改纂日記的討論，無不受到金梁《近世人物志》的啓迪。而且晚近以來關於翁氏日記的改纂研究，可以說都是在金梁的發現的基礎上繼續進行的。

#### 四

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出版已有半個多世紀，但此書對當今的歷史研究與晚清人物傳記之寫作，仍有不少幫助。我們這裏並不是說金梁本人的論說多麼重要，多麼精彩，而是指他通讀理解，融會貫通，整理編排的近代四家日記之內容，以及他用這些內容勾畫的為數衆多、形形色色的晚清人物志略，在近代史研究以及清人傳記寫作中仍可作為借鑒。金梁通過自己的辛勤耕耘，向人們展示了這些近代著名日記，在勾畫人

<sup>①</sup> 金梁：《近世人物志》，第十六頁。